



以文艺推动“人的现代化”

□袁正领

文艺具有直击人心的审美感染力,是人们进行现代文化心理建构的有力推手。因此,新时代文艺应注重抒写时代精神的强音,推动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致力于对人的心理进行多维形塑

当今中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建构现代文化心理。

什么是文化心理,什么是现代文化心理?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主题,是权力欲望与伦理道德孰轻孰重的灵魂拷问。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比干为了使狐妖现出原形,甘愿将自己的七窍玲珑心挖出来逼妲己吃下,而面对现出原形的妲己——九尾狐妖,殷寿却说“这不是妖,分明是祥瑞”。这就应了那句话:心魔即魔,心佛即佛。比干表现出的是对社稷的忠诚超出了自身的生命,而殷寿表现的则是强烈的个人欲望淹没对江山社稷的社会生态。从社会的视角看,这种由多要素形成的、每个人都具备的情理结构就是文化心理结构。它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经验的理性提升、内化、凝聚以及与自然感性的融汇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积淀。其中包含着群体与个体的统一、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这是人类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根本所在,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文化心理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相对稳定的因素,又会随着社会实践变化而变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要实现现代化、塑造时代新人,就应培育人们基于新时代社会实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文化心理,塑造人们积极向上、蕴涵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们能够正确判断什么是和谐、什么是崇高,何时该奋发、何时应超脱,而不是对美好的事物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或者难以适应环境的压力,找不到心灵的寄托。现实中,有的贪欲远超出理智,有的牢骚远多于贡献,有的稍遇困难就陷入焦虑,不都是现代文化心理建设不足的写照吗?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家层面实现现代化,还是个人层面追求美好生活,塑造健康、丰富、现代的文化心理都是必修课。

文艺具有直击人心的审美感染力,是人们进行现代文化心理建构的有力推手。从本源上说,美感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在心理上产生的愉悦感,无论审美视域如何拓展变化,美感的由心而生不会改变,艺术是美感的集中体现,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形式,最能使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心潮澎湃,在人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对于新时代肩负文化强国建设使命的文艺战线,更应深刻认识文艺在现代文化心理建构中的重要价值,自觉承担责任使命、把握创作规律,将先进思想和经验内化为人们的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好塑造时代

新人。这无疑应成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当然,这种建构是全面的、多方位的。这里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抒写时代精神的强音。以艺术的形式抓住时代精神的共鸣点,从而记录时代风貌、奏响时代强音,感化、陶冶更多的人心向光明、创造未来,并将这种文化记忆沉淀为影响久远的文化基因,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民族走过的共同路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也得益于这种记录的存在。汉唐的国力强盛与当时的赋、诗等文艺形式的繁荣相辅相成,后者同样发挥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科技、生态等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无可阻挡。江山壮丽,人民豪迈,这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就文艺来说,应更多地记录时代场景、反映时代精神,像路遥那样做“时代的书记官”,用精品力作汇聚人们奋发有为的磅礴力量,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留下能够泽被后世的精神财富。这既是历史责任,也是历史机遇。在新时代,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注重表现我们民族所具有的优秀精神品格。比如,长篇小说《人世间》之所以广受好评,就是因为它以平民视角,描写了周家(主要是三兄妹)及有关邻里在近50年的社会变迁中心系家国、坚韧顽强、纯朴善良、情义相托的精神风貌。尽管伴随诸多艰辛、困苦甚至不测,但他们仍“一心向阳”、追求进步与美好。这既是民族精神的底色,更是时代精神的映射,还是人们内心情感的深度触发和再次建构。总之,卓越的文艺作品可通过对时代精神的形象表达,让人们模糊的感觉变得清晰,自发的行为变得自觉,外在知识变为内在心理积淀,塑造积极进取、勇于创造、尚法崇德、大气包容的健康人格,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增添新的内涵。

二是推动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文化心理强调的是“现代”。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创新创造,形成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仍极具时代价值的优秀思想观念,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核心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每个人情感心理的重要架构和底色。在当下,我们依然需要继承这些精神财富,并不断转化为介入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但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文化是伴随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产生的,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有些过时的、有害的东西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甚至形成心理上的潜意识、无意识。自晚清,特别是五四以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就为“改造国民性”而努力,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鲁迅的《阿Q正传》《药》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但观

念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仍需做出努力。比如,有些人“笑贫不笑富”,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作祟;有些人深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影响,给教育、就业结构的优化带来困难,也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烦恼;有些人视“人情”重于法规制度,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阻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感触颇深而又非常无奈的痛点。可以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化,最终要靠现代文化心理的形成。这需要文艺工作者给予高度关注、用心用力。比如,电视剧《城中之城》着重反映了现实中法纪与人情在一位主人公心中的撕扯,最终以悲剧警醒世人。《人生之路》则反映了非法侵害别人利益者的内心不安和撇开人情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者的决然,最终主人公以包容之心实现双方和解,都有很强的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建构现代文化心理的价值。这无疑应是艺术创作持续着力的方向。

三是致力于哲学视角的多维形塑。现代文化心理建构是面向大众的。它追求的效果应是进取与和谐相统一的心理状态,既要保持对现实功业、美好生活的追求,又能实现心灵的自我调适。这在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中有过成功的实践,李白、刘禹锡、苏东坡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成功运用以儒为主、儒道释互补的思想体系,形成积极进取、丰富多元、乐观豁达的内心世界,以适应人生的各种境遇。其诗词作品如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西塞山怀古》、苏东坡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现代人的文化心理建构,也应继承这些文化传统,着眼于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和人性固有的内在矛盾,促进人们内心情理结构的主辅兼备、多元一体,既让进取者获得精神力量,又让失意者获得心理慰藉,从而更好地把握个人与群体、感性与理性、进取与平衡、欲望与节制等矛盾的适度协调,始终保持一种动态的和谐与宁静。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早已越过改革开放之初的粗放扩张阶段,再加上技术迭代对产业格局带来的冲击,人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因而,在鼓励进取精神的同时,建构多元自洽的文化心理,也是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现实需要。这就需要发挥文艺的精神引导和情感心理塑造作用。比如,新编越剧《苏东坡》不但表现主人公的济世情怀,还重在表现其虽遇挫折却仍能通透豁达的内在涵养。这对缓解一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塑造多元文化心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文艺并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而是应从哲学高度观照现实、提升立意,塑造人们多维文化心理和健康和谐的人格。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副研究员)



当前,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如火如荼,评论界对它的学术探讨也日益深入。有学者曾将这些学术讨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围绕“新大众文艺是什么”进行探讨,侧重于概念的定义与争论;第二个阶段则追问“新大众文艺为什么”,试图探讨在数字媒介时代如何建立大众与文艺的新型逻辑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新大众文艺研究从“是什么”向“为什么”的递进,是大众对文艺生产逻辑的深层反思。在我看来,这一理论的建构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且是当前最为紧迫的课题之一,即从“我们为什么需要新大众文艺”跨越到“我们需要怎样的新大众文艺”。

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已经成为共识,但其“应然”状态,即它应当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承载怎样的价值,仍然处于一种模糊状态,缺乏清晰的评判标准和必要的审美判断。因为这不仅关乎新的历史条件下媒介在文艺创作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边界,还关乎大众与文艺之间辩证关系的再次重构,更关乎新大众文艺能否真正抵达接受者的内心世界,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回应时代命题与社会关切。

首先,在媒介维度上,我们需要一种共创共生的新大众文艺。大众对于文艺的需求正由单一的消费转向多元的参与,运用新媒介不应仅将其简单地视为传播的便捷工具,还应将其视作审美空间的拓展载体。随着AI技术的迭代与数字媒介的普及,传统文艺中“创作者—受众”的单向度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共享与共创的新型文艺媒介生态。在这样的生态中,所谓的“受众”不再是单一的客户消费接收端,更是共生共创的创作端。在网络文学的发展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读者的点击、点赞、榜单推荐等机制,让创作无时无刻不在读者的审视中进行与调整。相比于传统纸媒阅读中的静态封闭文本模式,网络文学真正意义上让读者从幕后走向前台。这些反馈所展示的,不仅是读者在阅读中的感受和体验,还有一个时代的风向与诉求。从纸媒的线性阅读到数字媒介的交互体验,迭代的不仅是技术载体,更是文艺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思想观念的革新。我们需要的新大众文艺,应有打破审美壁垒的媒介自觉,让不同群体与不同背景的受众在数字化场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使受众真正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实现文艺的普及与审美的提高。

其次,在内容维度上,我们需要一种人文底色与艺术本真相统一的新大众文艺。媒介赋能不等于审美降级,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在技术流量与艺术特色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我们既要借助技术扩大影响力,更要守正文艺的人文温度。所以,新大众文艺创作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根系深植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因为真实的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大众文艺

□许永宁

幕式上所强调的,“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从内容选择的角度来看,低俗、庸俗与媚俗的作品不应是新大众文艺所提倡的,更不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更不能以流量的逻辑来替代作品思想内容的评判标准,要坚持文艺的主体性,坚持文艺是以艺术为核心的精神创造。因此,我们需要的新大众文艺,应当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向善生态,坚决抵制低俗化、同质化的快餐式生产,让文艺回归到对真善美的本真追求上来,建设一个健康有序且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家园。

再次,在传播维度上,我们需要一种开放多元、破茧而出的新大众文艺。在数字媒介时代,我们必须警惕算法逻辑带来的文艺伦理危机。当流量推送将受众禁锢在相似风格、近似主题的内容之中时,需审慎区分的是:这究竟是时代情绪的共鸣,还是算法制造的审美幻象?前者是对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而后者则是对个体审美偏好的精准围猎。在便捷化、多元化的网络空间中,媒介不仅是客观中立的技术工具,还应是思想交锋和文化交流的有力参与者。媒介由作为主体的人创造和掌握,是反映人、表现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外化环境。因此,我们需要的新大众文艺,应当是一种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传播生态,而非封闭单一的“信息茧房”。它应当鼓励创造性的发现、跨领域的融合以及高品质的输出,确保新大众文艺的多样性不被消解,创造性不被扼杀,持续性不被中断。

最后,在机制维度上,我们需要一种价值导向与公平激励并重的新大众文艺。机制的滞后往往会导致创作的异化。为了防止新大众文艺陷入流量至上或资本裹挟的泥潭,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与约束机制,用以引导创作者从追逐热点转向打磨经典,引导大众从感官刺激转向审美自主。大众艺术审美的养成,不仅需要作为个体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觉醒和艺术自觉,还有赖于社会的引导与规范,单纯依靠媒介宣传与流量驱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造成失衡。一个良性的文艺生态,应当既能够保障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又捍卫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既鼓励具有原创性和正向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又能满足大众的多元审美需求,进而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完善大众的评判标准,为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综上所述,新大众文艺不应仅仅是技术的叠加或形式的翻新,而应是一次关于“文艺如何回归大众”的深刻实践。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技术赋能下依然葆有活人感、在多元需求中依然坚守艺术底色、在算法围猎中依然保持高品质的新大众文艺。唯有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精神的记录者,成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不竭源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非虚构’写作中的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4YBA132)的阶段性成果]

■书 评

从“文学行动”的视野重新理解“鲁迅文学”

——评汪卫东《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

□何欣潼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卫东长期从事鲁迅研究。他在新著《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中以“文学行动”的视野对鲁迅进行整体观照。我们知道,作为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一直是现当代人文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围绕他的研究也形成了范式更迭的学术史。有的研究探讨鲁迅文学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关系,有的着重分析鲁迅作品如何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还有的则转向对鲁迅个体内在世界的阐释。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鲁迅研究者逐渐放弃整体意识,在文本细读和材料研究上细耕,越来越专业化,但也呈现出碎片化倾向。碎片化的鲁迅研究缺少对鲁迅文学关怀的追问,也失去了与现实互动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汪卫东提出以“文学行动”的视野来构建一种“鲁迅文学整体观”就显得尤为必要。

著者的问题意识从追问“鲁迅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存在开始,认为鲁迅既不认同纯工具性的口号式写作,也不属于带有商业消费色彩的消遣性写作,并且与西来的“纯文学”保持距离,“鲁迅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书中写道:“鲁迅不是以作品,而是以终其一生的现实行动,展现了‘鲁迅文学’的存在。”鲁迅文学”是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行动性”是“鲁迅文学”的鲜明特征。在鲁迅这里,文学是介入现实、参与历

史的社会行动,也是追问自我、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是有限自我与大时代共存亡的方式,‘鲁迅文学’外在介入现实,同时内在切入自我生命,内与外相辅相成。”这就分析了鲁迅“文学行动”的“内”与“外”两个向度。这一整体观对于鲁迅研究的意义有二:一是将“鲁迅文学”还原到自身的动力系统中,遵循其内在逻辑,展现“鲁迅文学”的行动轨迹;二是打通内与外的通道,找到“鲁迅文学”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契合点,展现个人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历史互动。

汪卫东用三次“自觉”和两次“绝望”具体描述鲁迅终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他认为,在与20世纪中国现实复杂互动的文学行动中,“鲁迅文学”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行动轨迹,经历了留日时期的“文学自觉”、五四时期的“小说自觉”以及20年代中期开始的“杂文自觉”,并经历两次绝望时刻,展现了内、外两方面都空前宏深的文学景观,拓宽了我们对“鲁迅文学”的理解。

在这一视野中,著者对鲁迅的生平、思想与文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具体说来,“文学自觉”是鲁迅文学行动的起点,弃医从文是其标志。对于弃医从文,中日学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凭《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理解其内涵,而日本学者基于对“幻灯片事件”的质疑淡化其存在。汪卫东认为,对弃医从文的认定,依赖其背后有无成熟的思想支撑。他通过对鲁迅留日时

期的五篇文言论文及《域外小说集》进行系统解读,揭示了其弃医从文背后自成系统的“文学自觉”。这是青年鲁迅对新的救亡方案、“新文学”及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独到发现。文学计划的挫折结合时代境遇,造成鲁迅归国后的十年隐默,这就是鲁迅的第一次绝望,其精神困境在S会馆时期达到顶点。鲁迅在S会馆隐默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在“金心异”的劝说下,鲁迅加入《新青年》,开始以现代小说的方式展开第二次文学行动,写作了《呐喊》。基于这一历史考察,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作出新的判断,认为鲁迅20世纪初对“精神”和“诗力”的思考,在十年后的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得到历史回响,因而弃医从文既是鲁迅个人志业的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鲁迅五四时期写小说本来不是一个問題,但在“文学行动”的视域中,这一选择成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在著者看来,鲁迅十年后选择现代小说背后,含有“小说自觉”的内涵,这是对自我边缘状态和现代小说文功能的双重认定。边缘呐喊的姿态需要小说的虚性来隐藏自身,十年间沉淀的洞察也需要具有强大整合性的现代小说结构来容纳。《新青年》解体加上周氏兄弟突然失和,导致鲁迅1923年在创作上的不活跃。汪卫东将这十年的沉默视为鲁迅第二次绝望的标志。有了关于第二次绝望的界

定,就有了对鲁迅后来写作《彷徨》《野草》以及杂文的新理解。在汪卫东的阐释中,鲁迅通过《彷徨》《野草》两部作品的写作,清理了自身的内在矛盾,尝试与悲剧自我告别。基于此,鲁迅“杂文自觉”的阐释也水到渠成。在以《彷徨》《野草》进行生命追问的过程中,女师大学潮爆发,鲁迅开始主动出击支持学生,杂文越写越多,形成了鲜明的“杂文自觉”。其杂文写作展现着对自我与时代本质的同时发现。

基于“文学行动”视野对“鲁迅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后,汪卫东又由此进行理论提升,提出“行动诗学”观。在他看来,“鲁迅文学”是“中西文学资源在20世纪中国之历史熔炉中熔冶而成的新的文学存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具有独特性,刷新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鲁迅文学’的行动性指向一种‘行动诗学’的可能”,“有助于我们反思‘鲁迅文学’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重思文学的本质,重拾文学的价值担当。

这实际上为我们重新审视一些通行的文学观念提供了契机。很多人习惯于将文学视为以“审美”为核心的“语言艺术”。但这种理解远远不够。著者提出:“‘鲁迅文学’的行动性指向一种动态的和整体的行动诗学。行动诗学将文学视为人类实现本质力量的一种话语实践,关注文学发生的动机及其诗学实现机制,以行动沟通文

学诸要素。”他甚至认为:“不是先在的文学性决定什么是文学,而是文学介入见证文学的存在,文学性是在基于理想文学人实现的文学行动中不断呈现并更新丰富的。”基于此,汪卫东将创作者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还原为最基本的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进而提炼出“文学话语”不同于其他话语的特性——“整体性”“非确定性”和“否定性”。而所谓“审美性”,就包含在文学话语的非确定性中。文学话语是对世界的“揭示”,是对存在边缘的不断抵达。

“行动诗学”有三方面的理论意义:一是将文学由以前以“审美”为核心,归属于“文艺”的定位,还原到动态的独特的“话语实践”上,彰显文学的整体价值关怀及其独特实现方式;二是打破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历史中心和读者中心相互割裂的文学理论模式,“将以前文学理论分别以作者、文本、历史或读者为中心的静态、分散的研究,整合到以文学行动为整体对象的动态、综合的研究中”;三是凸显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维,展现了鲁迅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主体性。

总之,基于“文学行动”视野的“鲁迅文学”整体研究及其延伸出来的“行动诗学”,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宏阔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在社会各领域的综合作用。

(作者系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